

邪恶天才 人间阎王

康生传

[美] 约翰·拜伦 著
罗伯特·帕克



康 生 传

[美] 约 翰·拜伦 原著
 罗伯特·帕克

顾兆敏 顾兆平 金朝晖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字:01—98—07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生传/约翰·拜伦 罗伯特·帕克著 顾兆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ISBN 7-5004-2401-9

I.康… II.①约…②顾… III.传记 IV.K7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01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雅科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5.75 插页:16

字数:3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30.00 元

献给

已悠然长眠的

作家、语言学家、我的朋友

戴维·波纳维亚(David Bonavia)

鸣 谢

如果没有包括外交部官员、研究机构和传媒机构成员以及高层领导人亲属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的慷慨合作，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以许多方式作出贡献，提供有关康生及其同伙的文件和文章，阐述党内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来龙去脉，品评康生一生中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他们无一例外都要求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因此，尽管我们欠了一大笔人情债，但我们还是不得不隐匿他们的名字。

我们还要感谢下列诸位，他们在其他方面给我们提供过信息和帮助：《时代》(Time)周刊的戴维·艾克曼(David Aikman)、白杰明(Geremie Barne)、朱蒂·鲍纳维亚(Judy Bonavia)、西蒙和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的埃伦·巴茨(Ellen Butts)、库超(Ku Chow, 音译)、文森特·迪马(Vincent Demma)、国会图书馆中国部的工作人员罗伯特·邓(Robert Dunn)和H·C·詹(H. C. Jen)、汉斯·凡·埃斯(Hans van Ess)、西蒙·弗雷德曼(Simon Friedman)、卡尔佛·格雷斯特廷(Culver Gleysteen)、安德鲁·戈斯林(Andrew Gosling)、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何汉煌(Harry Harding)、丹尼·凯恩(Danny Kane)、彼得·科尔克(Peter Kolk)、罗辉明(Lo Hui-min, 音译)、《百姓》杂志的陆铿、已故的凡·S·朗(Van S. Lung)、贝蒂·麦金托什(Betty McIntosh)、H·鲁曼·米勒(H. Lyman Miller)、弗兰克·迈尔斯

(Frank Mills)、胡佛学会(Hoover Institution)的马若孟(Ramon H. Myers)、道格拉斯·H·佩尔(Douglas H. Paal)、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乔纳森·D·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理查德·里格比(Richard Rigby)、西德尼·林登伯格(Sidney Rittenborg)、彼埃尔·赖克曼(Pierre Ryckmans)、玛丽·安·西韦尔(Mary Ann Seawell)、卡尔登·斯威夫特(Carlton Swift)、胡佛学会的马克·W·特姆(Mark W. Tam)、弗兰克·唐(Frank Tan)、迪克·维克多里(Dick Victory)、台北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王玲玲、台湾大学的王文兴、《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迈克尔·威斯科帕夫(Michael Weisskopf)、约翰·威尔海姆(John Wilhelm)薛雷(Xue Rui, 音译),以及国家档案馆的爱德·伯恩斯(Ed Barnes)、理奇·博伊兰(Rich Boylan)和凯西·尼卡斯特罗(Kathie Nicastro)等人。

几位苏联汉学家也提供了康生在苏联期间以及同苏联人交往的珍贵资料。我们特别要感谢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苏联中国问题研究会会长、苏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米哈依尔·L·特依塔伦科(Mikhail L. Titarenko)和研究所的高级顾问、翻译塔玛拉·卡冈诺娃(Tamara A. Karganova),以及其他许多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其中包括远东研究所的伏拉基米尔·I·安东诺夫(Vladimir I. Antonov)、马列主义研究所副所长E·克依塔耶夫(E. Keitaev)、东方研究所的列夫·P·德鲁尤辛(Lev P. Delyusin)、《文学报》编辑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Fyodar Burlatsky)以及马列主义研究所的阿娜斯塔西娅·I·卡托乌诺瓦(Anastasia I. Kartounova)。

美国新闻署的比尔·雷金斯(Bill Reinckens)、乔治·华盛

鸣 谢

顿大学的 R·密勒教授 (Professor R. Miller)、《卫报》(The Guardian) 的马丁·沃尔克 (Martin Walker) 以及奈克·达尼罗夫 (Nick Daniloff) 都在我们同消息灵通的苏联人士接触时帮了不少忙。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以下人员：西蒙和舒斯特公司的两位出色编辑玛丽·阿拉那·沃德 (Marie Arana-Ward) 和编辑部主任道格拉斯·伍德亚德 (Douglas Woodyard)；国家档案馆的约翰·E·泰勒 (John E. Taylor)，他对有关军事和情报事件文献的博闻强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现在在新港 (Newport) 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亚瑟·沃德隆 (Arthur Waldron)，他阅读了最初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提摩西·迪金森 (Timothy Dickinson)，他对历史和文学百科全书般的广博知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叙述康生的生平；还有我们在威廉·莫里斯公司 (William Morris) 的代理人罗伯特·龙特里伯 (Robert Gottlieb) 和梅尔·伯杰 (Mel Berger)。

有三类暴君
一类施暴肉体
一类蹂躏灵魂
一类肉体灵魂齐压制
第一类称作帝王
第二类称作教皇
第三类称作人民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社会主义中人的灵魂》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引言：看不见的手

很少有局外人知晓毛泽东和那个专干卑鄙勾当的邪恶人物之间的关系。对局外人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或许是一位农民气味的“好警察”，但是毛用来统治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却受到诡计多端的“坏警察”、东方的马基维利(Machiavelli)、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康生同志的深刻影响。

康生是谁？一个模糊又不可思议的人民委员，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泽东的媒人、国际关系专家，还是一位老资格的审美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顾问。然而最主要的，康生那令人生畏的显赫，源自他多年来一直担任秘密警察首脑。他建立了一套体系，用来消灭成千上万中国同胞，奴役且折磨数量更为广大的民众。

康生微妙的政治艺术、优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泽东着迷，使他成为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势力之一。确实，在康生旁边，毛泽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似乎逊色不少。毛泽东尽管具有魅力，但相较而言仅仅显露出平面的东西；康生则是个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纵者，借由使人遭受极度痛苦和毁灭的艺术手腕，他把鉴赏能力和情报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种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犯罪的欢愉中。康生的恶毒最终为他赢得了—一个恰当的神话头衔，要是有人胆敢当他的面叫他“阎罗王”，也许会让他觉得高兴和有趣。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共产党最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去世,那是在他试图向体制中注入一种自由精神而被剥夺了权力的两年之后。一九七八年在一次谴责康生的秘密演说中,胡耀邦曾把康生比作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i),^①比作步捷尔任斯基后尘的冷酷凶手拉甫连蒂·贝利亚(Lavrenti Beria)。这种评价是大多数明达的中国人的共识。

康生本人乐于与捷尔任斯基作比较,甚至接受这个比较,但是更贴切的类比人物是贝利亚。康生一生大多数岁月都担任秘密的警察首脑,这支秘密警察力量在它存在的头十年里为红色中国的巩固出了大力,尽管这未必全部归功于康生(此时他多患病修养)。事实上,他卷入安全工作的时间足足有贝利亚三倍长。尽管种种传奇色彩围绕着他,贝利亚主持苏联秘密警察工作仅有九年时间。他们同是制造恐怖的官僚,但是康生和贝利亚的共同之处远不止这些。贝利亚曾是外省的行政官员,工业界的头目,以反常的性趣味而声名狼藉,他是斯大林的很少几个亲密朋友之一。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和贝利亚会用格鲁吉亚语恐吓别人,这是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懂的语言。像贝利亚一样,康生也扮演其他许多角色。

尽管康生最后一个进入主席的核心圈,他却是毛泽东最依赖的人。毛泽东的其他亲密战友都是二〇年代或三〇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三〇年代中期史诗般的长征期间同毛泽东结下了牢固的关系,而那时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回国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他很快就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使自己成

为毛性情相投的知识分子朋友。康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比较有教养的，但他的富贵血统并不妨碍他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不满来反对那些自以为比主席优越的知识分子。康生和毛泽东在一起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后在北京，而后在晚年巡视国家的途中，一起讨论政治、中国历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帮助润色毛泽东的诗词和推敲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文。

毛泽东则赋予康生巨大的权力来回护他。尽管康生干了许多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行，他仍被安排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并受到保护免遭批评。一九四七年，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康生施行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产生憎恶；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义愤填膺，但毛泽东认为应把康生的工作方法挑选出来，做为反“右倾”的一次胜利而广为赞扬。身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集会上的代表，康生在适当的时候会随意歪曲会议记录，挑选他认为主席想听的东西汇报，并给自己带来荣誉。其他出席那些会议的中国领导人都不敢对康生的说法提出质疑，而毛泽东相信，如果从康生那儿听到什么事情，那就是真的。

根据可靠的证据，康生还是江青的密友和旧相识，这位漂亮妖娆的女演员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康生和江青在一九二四年山东省诸城那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城镇相遇，那时康生二十六岁，江青十四岁，他很可能是她众少年玩伴中的一个。十三年以后，当江青在延安共产党总部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时，康生热切地帮助她去追求他的保护人。毛泽东的

其他同事怀疑江青是国民党间谍,但是康生为她担保,使毛泽东可以同她结婚,这赢得了他们夫妇终生的感激。

康生是个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他把斯大林主义镇压和控制理论引进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的四年里,作为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他把对秘密警察工作的透彻理解带回中国:怎样在审讯中逼供取伪证,以此达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康生把这些才能供毛泽东支配,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中,他们的配合默契十足。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左倾”主义控制建立了一种典范,直到八〇年代中期。

康生运用斯大林的方法来消灭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他偶尔也抓到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但是,他的受害者通常都是他个人的敌人和其他人,他们被迫作出的供词都是为他自己肮脏的意图服务。像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处于高位时一样,康生在他拥有权力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备有一张假想的叛徒名单,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②然而,与麦卡锡不同的是,他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约束,法律制度除了合情合理的怀疑之外还需要指控罪行的证明。而康生从不必担心政治上有用的迫害会被单纯的事实真相所推翻。

康生是中国劳改营的创建者。他建立和主持的这个系统在上海、莫斯科、延安和北京运作达半个世纪,说不清有中国人在其中被囚禁、拷打和处死。康生拥有一支“声名狼藉的审讯官”队伍,并被委与全权采用各种拷打和盘问的方法。在康生手下做了若干年审讯者和拷打者之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苦

难就变得无动于衷。他们发明的众多方法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它拖着那个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他被拖死；强迫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它是古代中国的水折磨法的改良；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

当康生对他的施虐狂队伍的努力不满意的时候，他会亲自介入，监督拷打并帮助发明使不幸者饱受痛苦和信口开河的新方法。他曾威胁要把毒蛇扔进囚犯的牢房来加快获取“供词”。当需要恐怖的戏剧性表演时，他会极其高兴地拴住囚犯们的鼻子，像牵着牛一样领他们穿街过巷。

康生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那苏联问题专家的声誉使他能够在五〇年代末和六〇年代初利用中国同莫斯科的冲突来扩大他个人的影响。康生煽动毛泽东对苏联政权的猜忌和怀疑，虚伪地将贬低主席的评论归咎于苏联领导人，狡猾地设法使他的保护人与莫斯科全面决裂。结果，世界力量的均衡发生了变化，苏联发现自己同时对抗西方和中国。即使当两大社会主义强权之间的斗争因变动的世界秩序而有所缓和，康生的影响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得到。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康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教父和主要煽动者之一。出于某种拉斯普廷和伊阿古式的传统习惯〔译注：Rasputin（一八六四～一九一六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宫廷中的一个有权势的宠臣；Iago为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奥赛罗那狡猾残忍的副将〕，康生以如下的想法毒害毛泽东的头脑：中国社会必须彻底清除所有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几百万人的生活被永远毁掉了。仅仅康生发动的一次反“外国特务”运动，据说就有

九十四万受害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无辜者。他们的命运就是以审讯、监禁到处死。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江青和“四人帮”这些六〇年代末和七〇年代初统治中国的激进派集团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如何更好地将这场运动转向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胡耀邦的报告中,康生是“‘四人帮’的黑顾问和刽子手……康生的黑手伸到全国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没有他作后台,‘四人帮’只不过是四个小丑,不可能企图获取权力,除非所有的好党员都死光了。”

江青一直被拘留,直到她自杀。她被监禁在秦城监狱围墙里特别为她建造的一座别墅中。据报导,她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上吊自杀的。^③她的良师益友康生,如果不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可能被清算之前就死去的话,或许会同她一起受到审判。康生死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逮捕的十个月前,等于是及时退场。不过,以康生的阴谋技巧、求生存的本能和在党内的资深地位,可能会拯救他和他的激进派同盟者。胡耀邦推测道,如果他没死的话,“四人帮”可能不会垮台。

康生是个无耻的阴谋家和勾心斗角的能手。除了毛泽东以外,他与每一位资深领导人密切交往的时候实际上都欺骗了他们。遭受康生迫害的一大串名单可以构成一座中国革命的名人纪念馆。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康生做出一件背信忘义的杰作,指控他最亲密的盟友江青通敌。但是他生平的最后一次成功指控,不因康生的死亡而失去作用:在去世前两个月,康生同毛主席最后一次会面,他警告毛泽东,邓小平会翻

文化大革命的案，应当清洗掉。毛泽东在康生死后听从了劝告。

康生实际上比他所有的受害者活得都长，这是他狡诈的最后证明。他喜爱以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把兴趣置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使他得以消除公众的怀疑并隐瞒他的大部分罪行。他活了七十七年，尽管受到普遍的憎恨，但康生死在他自己的床上，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死于癌症。

如此结束了他享乐主义的漫长一生。康生曾因诱奸父亲的小妾而闻名，成为家庭的浪荡子。为了试图约束康生青春期的乱交倾向和反叛行为，他父亲安排了一个当地姑娘同他结婚，但是康生逃脱了那场婚姻，同一个名叫曹轶欧的共产党员结了婚。康生从未操心同他第一个妻子离婚的正式手续问题。

康生也是个有瘾的鸦片吸食者，这是一名向本书提供材料者在五〇年代初期发现的，当时她去探望在北京医院里养病的康生。她发现他带着全套吸食鸦片的工具：烟枪、烟灯、用来在火苗上烧烟泡的细针和小匙。康生利用他的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尽管那时候共产党正在无情地处决任何进行毒品交易的人。

康生有些乐趣显然是很平常的，只有在那个荒谬的环境里才被称为恶行；在那儿，一个高级官员在办公室里放置鲜花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奢侈。康生非常溺爱他的北京纯种爱犬，这是过去专为皇室预备的，尽管共产党政府禁止它的公民豢养爱畜。在政府的眼里，爱畜耗费珍贵的食品，还使人回想起中国资产阶级的过去。通常数量不多的犬类被饥饿的平民

绞杀吃掉。豢养宠物并不是康生唯一的闲瑕生活乐趣，他还雇了一名厨师，这个厨师曾替一九一一年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烧过菜。康生赞成共产党所有的清教主义戒律，只要它们不干涉到他头上。在他心中，他是高于统治大众的法律之上的。

康生还是位画家和书法家，以他非常罕见的才能而闻名：左右手都能同样熟练地使用毛笔。他作为一名收藏家和艺术保护人，积聚了许多无价之宝：绘画、瓷器、青铜器、砚台和古代手稿，这些都是他曾帮助摧毁的世界宝藏。就像美国间谍大师詹姆斯·J·安格里顿（James J. Angleton）以他对兰花和诗歌的兴趣而著称一样，康生有自己的审美爱好。但是康生的艺术追求散发出一股恶毒的气味；他“拥有”的许多艺术品是文化大革命中由红卫兵为他欺骗和偷窃得来的。康生不仅想要占有艺术，而且在他的权力巅峰时期，他无情地迫害那些以前令他妒忌的艺术家，这非常像他的门徒江青设法消灭那些制片人和演员，他们曾在三〇年代的上海阻碍她往电影方面发展。

康生的许多罪行几十年来一直隐藏着，但是对于政治上自觉的中国人来说，他是个邪恶的化身。在众多围绕着他积累起来的传奇中，他变成了幽灵般无所不能的恶魔。至少有两本书这样报导，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以后他在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六年内，康生正在安排一个阴谋，窃取情报以发展中国的核武器。事实上，康生那几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显然是经历了某些方面的精神崩溃。经过几年的逐渐康复，他得以重返社会生活，重新回到党最高层，展示他在政治生存中的

出色技巧和毛主席对他似乎是无比信任的关系。

但是在神话和流言是非的耳语世界里，康生依然是中国的魔鬼，任何邪恶或神秘的事件都归罪于他。当他的对手，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次空难中丧生时，许多人都认为康生是行凶者；其实不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架载有十二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军用飞机坠毁在山西省的一座山脉中，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康生的对手——前安全部门首脑。这次空难又被说成是康生的破坏；其实也不是。一九七一年林彪试图推翻毛泽东的计划失败后，在出逃途中死于另一次飞机坠毁中，又有人怀疑是康生干的；其实他们都错了。

康生还被指责要为六〇年代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柯庆施和前国民党将军李宗仁的死负责，李宗仁背叛了国民党，并且投靠共产党。这次康生又是清白的；柯庆施在吃过一顿辛辣的川菜后死于心力衰竭，李宗仁则因年老体衰而身故。

每当一桩不可解释的悲剧在中国发生时，康生的名声就变得如此，他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怀疑对象，就好像一位美国人被认为要为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小马丁·路德·金的神秘谋杀案负责一样。④关于康生那些未被证实的罪行和纯为推测的神秘功绩，几乎表明了他的权力之所在，同样也激发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想像力。就他个人而言，康生具有那种恶魔般的神秘性，西方的阴谋家把这种神秘性归于像黑手党和中央情报局那样的组织。

到了七〇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之时，康生的可怕地位给整个现实投上了阴影，他被认为是先前十年那种民